

“馆奴”樊建川

“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，少我一个没关系。中国十三亿人，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，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，敲响警钟，去做牺牲，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”

本报记者惠小勇、叶含勇、童方

“现在有说房奴、车奴的，我称自己是‘馆奴’。”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对自己的定位。他在过去的13年间、倾尽自有资金20多亿元，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建起涵盖抗战、民俗、红色年代、抗震救灾、红军长征五个系列29座博物馆，接待参观者1千多万人次。在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，近5年持续实现经营有盈余，带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转型为以博物馆产业为特色的文化小镇。

“维持生计”
将博物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
如今实现每年近2000万元盈余

在成为馆长前，尽管有收藏近现代文物的爱好，樊建川主要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，他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不仅拥有自己修建的商品房，还有办公楼、商铺、加油站……个人资产最高达到二三十亿。在这个时候，虽然知道“做博物馆一定赔钱”，他还是产生了从“主要做房地产”转到“主要做博物馆”的想法。

“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，少我一个没关系。中国十三亿人，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，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，敲响警钟，去做牺牲，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。”

2003年，樊建川竞拍购得安仁镇500亩河滩荒地，向他的第一个梦想发起冲击：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开放5个抗战题材博物馆。

“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，这是一个甲子，是我们民族的一件大事，我想，我必须有所舍弃了。”这一年，樊建川卖掉了自己的办公楼、商铺、加油站，把钱整个投到了博物馆。

待完成前期手续真正开工时已是2004年11月，距次年8·15剩时9个月。樊建川回忆说，“当时没人相信我能完成，包括成都市的领导，他们说9个月把房子修好都不错了，更别说陈列也要花几个月时间。”

“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9个月，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，从打桩修房子，到陈列、布展、灯光、安防，我们是一路拼出来的。往往顶还没有封，就开始布展柜，这边装电梯，那边装玻璃，我全天候泡在工地，累了就垫一张纸板，睡两三个小时。”

2005年8月15日，展现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抗战的“中流砥柱馆”，反映国民党抗战的“正面战场馆”、纪念美国援华的“飞虎奇兵馆”，还有“不屈战俘馆”“侵华日军罪行馆”，以“预展”形式如期开放。后经文化部、民政部等6部委专家组现场严格审查，正式开展。

随后几年，樊建川再接再厉建成“川军抗战馆”“中国壮士群塑广场”“抗战老兵手印广场”“援华义士广场”等抗战系列场馆。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已印有4000多名抗战将领或老兵的鲜红手印，为取这些手印，樊建川跑遍全国，甚至多次跑入太平洋。

今年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，樊建川仅用半年就建成了“红军长征在四川”博物馆，以980多件珍贵文物、580多幅历史图片、场景复原、多媒体互动等手段，生动再现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经历的奇绝惊险和回环曲折。同时为四川一些革命老区筹建红军长征纪念馆提供专业服务，捐赠了总计1000多件文物。

建川博物馆聚落改变了人们“博物馆是一个大房子”的固有观念，它是一个公园式的博物馆聚落，每座馆散落于“公园”之中，参观者花40至50分钟便可粗略看完一个馆，就像上一堂课一样。

博物馆是公益事业，需要大量投入，效益却不可观。建川博物馆聚落从土地、建设、文物、展陈等等方面都投入了巨大资金，如今实现了每年近2000万元的盈余。

“我下决心建博物馆时，朋友曾苦劝说，让一个人完蛋，吸毒；让一个企业完蛋，建博物馆。博物馆的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了，但我要求能通过博物馆的运营维持生计。”樊建川说。

为了“维持生计”，樊建川将博物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。在聚落中，有“人民供销社”“工农兵旅馆”“人民公社大食堂”“报纸展销中心”等综合业态，提供博物馆旅游休闲配套服务。还有能勾起儿时回忆的白糖“老冰棍”、个人生日当天的报纸、《嘹亮》歌碟等文创产品出售。此外，樊建川利用自己熟悉博物馆策划、陈列、管理的优势，成了重庆、青岛、宜宾等地的“博物馆提供商”。

到过建川博物馆的人，都感叹这里展出的文物量大质优，有404件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；而当记者走进其藏品库房，则不由惊叹樊建川30多年收藏之巨，仅与“文革”有关的藏品就有数百万件，其中包括手写资料二三十吨、书信三四十万封、日记一万五到两万本、像章上百万枚、票证上百万份……全部藏品一千余万件，展出部分不到其收藏的1%。

这么多的收藏，谁也想不到，樊建川是从“捡破烂”开始的。

“从文革开始，我萌发了收藏的兴趣，刚开始是为了知道父亲为什么被批斗。传单、小报，特别是牵扯到父亲的，都收起来。后来渐渐有了兴趣，就到废品收购站去买，还在垃圾堆里捡。”樊建川说。



▲樊建川在手印广场。

照片由建川博物馆提供

樊建川告诉记者，靠“捡破烂”和“找人要”收不了多少东西，真正藏品丰富起来是在有了市场以后：“十几年辛辛苦苦搜的东西，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，有市场是个很幸福的事。”全国近现代文物市场的兴起，樊建川“立了大功”。最多的一年，建川博物馆收到的集装箱有三百多个，里面都是全国各地发来的收藏品。

每一个城市，都有樊建川的联络站，都有人帮他收文物，不仅在国内收，还到美国、到日本去收，最让樊建川自得的是到日本去“反扫荡”。

在国内的拍卖场中，樊建川曾几次失手，经过了解他才知道，跟他“抢文物”的是日本的收藏家。

“后来我想，你能到中国来买东西，我也能到日本去买。套用当年战争时期的语言，你可以扫荡，我也可以反扫荡。”樊建川说。

去日本，除了收购文物，樊建川还去了靖国神社。因为他觉得，要搞抗战博物馆，必须研究和了解靖国神社。

“我坚决抨击靖国神社，靖国神社绝对是军国主义的，是特别丑恶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一个馆。他们不但供奉战犯，还陈列了飞机、大炮、刀剑等战争凶器，他们歌颂美化侵略者，是一个战争博物馆，不只是烧一炷香那么简单。”樊建川说。

得道多助
连起海内外众多侠肝义胆

在收藏和建馆过程中，樊建川精力旺盛、激情四射，许多尘封在历史中的人与事被他激活了，由此为爱国主义教育和统一战线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作为近百年来第一个以胜利者身份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军人，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官廖季威曾押解日本战犯回国受审。后来，他的手印留在了建川博物馆抗战老兵手印广场。

“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她的捍卫者，在这些老兵凋零之前，我们应留下他们的印记，以为永世的纪念。留下一个手印，就留下一分力量。”樊建川说。

在中国壮士群塑广场，约3000平米的中国地图上，200多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广场揭幕时，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抱着父亲的塑像痛哭：“爸爸，我抱您了！”她对樊建川说：“平时看父亲都是平面的照片，今天拥抱了立体的父亲，感觉特别幸福和满足。”

2004年，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来到安仁，为援华美军馆题写馆名，并即席唱起了《满江红》，她说：“我年轻时，在街头宣传抗日就唱这首歌。”

此馆开馆日，曾在飞虎队中开轰炸机的84岁老兵格鲁伯坐着轮椅赶来，进了援华美军馆就问：“樊先生，你这个大房子里全是放的美军的东西吗？”樊建川说是，他马上就哭起来了：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。我的青春，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。我为人类和平做出的最大贡献，就是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。”

格鲁伯坐在轮椅上，给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他说：“我代表美军士兵感谢您。”格鲁伯还把视如生命的私人抗战物品全部捐给了建川博物馆。

樊建川在多次赴日收集日军侵华第一手罪证时，获得了不少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，收购相关物品数万件。侵华老兵盐谷保芳每年都要到建川博物馆捐赠侵华文物。在壮士广场，他还手绘草图，恳请樊建川给他塑造跪像，以示永远谢罪。

记者看到，建川博物馆每一座建筑的风格都与展览内容深度契合，这得益于一批国内外建筑设计大师的精心支持，其中包括徐尚志、彭一刚、程泰宁、张永和、刘家琨等国内著名建筑设计师，还有矶崎新、切尔特·怀东这样的国际知名建筑师。

“对这些建筑师，我特别尊重，他们都特别认真，每个馆都是自己亲手作，都要跟别人竞争。而且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干或者说钱太少了，因为一位建筑师的报酬就十五万，这些就只够机票钱。”樊建川认为，这些建筑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。

矶崎新在设计“侵华日军罪行馆”时，日本右翼写信威胁他说：

“你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，是我们最好最优秀的设计师，为什么给中国人设计抗战博物馆？”矶崎新说：“我这把岁数不会考虑这个，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。”

当过知青的樊建川，还特别建起了一座知青生活馆，献给活着的和已经离开的知青。2009年，是知识青年集中返城三十周年，樊建川拿了一个奖，颁奖词里说：“正是他，使我们的集体找到了回忆，使很多的个人找到了自己灵魂的皈依之处。”

建川博物馆更得到了李敏、周秉德、任远芳等开国元勋后代们的大力支持。周秉德说：“建川先生建这个博物馆是为国家和民族计，他会好好保管文物，我们都非常支持他。”

建川新梦
想建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

樊建川时常说，我这一生就是用来建博物馆的。但他也清楚，个人的生命总有一天会走到终点，这让樊建川有很大的紧迫感。他总是在想，如果自己突然发生意外，博物馆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困扰他很多年，直到2007年，他决定把博物馆交给政府。

2007年12月6日，樊建川和妻子关于“将建川博物馆聚落以及所有文物无偿赠与成都市政府”的决定经过公证，在法律上正式生效。经专业估价，捐赠标的市场价值在80亿元至100亿元。

“这天之后，突然一身轻松。我觉得交给政府好，政府也许不会新建什么馆了，但守住它，把它保管好，一点问题没有。我知道博物馆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，我的文物和博物馆还能说话，还能讲故事。讲多久呢，希望是一千年。”樊建川说，他还告诉女儿：“我死了，你参观博物馆要自个儿买票。”

樊建川的选择让很多人弄不明白，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，为什么会把全部身家拿来投入到很艰难赚钱的博物馆事业，而且死后还要把博物馆“裸捐”国家？

正如诗人流沙河的评价：“他办博物馆立志救世，为人太多，自为太少”，很像庄子书中的尹文子。至于粗茶淡饭，布服素衣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又很像墨子。”

记者走近樊建川了解他的经历后，答案渐渐清晰。今年59岁的樊建川早在当知青时，就是民兵连长、团支部书记；参军后，因为“打二锤（手抡钢锤敲击钢钎打炮眼）”，学雷锋、搞宣传表现突出，被评为全师标兵；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，冒着生命危险扑救了一个错扔手榴弹的女兵；做宜宾市（当时为县级）常务副市长时，亲自摆地摊帮农民卖芽菜，还发表文章“钱让农村土地承包周期”，反映土地调整期短（当时土地承包期为15年）影响地力加速土地变质的问题。

“虽然当了市长，但我仍然穷得连一件西装都买不起。”樊建川说，由于当时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收入支撑不了他的收藏嗜好，1993年他选择辞职下海。

在房地产行业干了10年，樊建川最好时做到了全省行业前十名，上过胡润富豪榜。他的企业在银行是3个A的信誉，也是优秀纳税企业。汶川大地震期间，他在极重灾区都江堰建设的小区没有倒一间房、垮一块砖。

谈起新的梦想，樊建川依然精神抖擞：“我现在最想建设一个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馆。从1978年开始，每年建1个，展现4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，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‘第一个百年’奋斗目标的伟大历史成就。”

樊建川认为，是改革开放给了他实现梦想的机会：“以前我最身强力壮的时候，干活累得要死，每天只挣一毛钱，两次饿得晕倒。现在我能干这么多事，不是因为我个人有多能干，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机会。”

在樊建川的办公室，记者看到两块并不起眼的石头，这是他从内蒙古自己当兵的一个废弃营房里捡回来的。在当年的营地上，有一种叫“干枝梅”的草，在地面大概只有30厘米高，开红花或黄花，但根却扎得很深，足足超过2米。

“我认为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，就应该像干枝梅，无论遭遇什么环境，都能不忘根本，不丢责任，不改激情。”樊建川说。

诸葛草庐何处寻

丁永勋

因为诸葛亮隐居地的归属问题，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又打起了嘴仗。先是南阳宣布要隆重举办“诸葛亮文化旅游节”，然后隔壁的襄阳坐不住了，通过宣传部官方账号发文，直斥“某地”是李鬼，认为自己才有资格办这样的活动。

南阳襄阳争夺诸葛亮，从它们分属两省之后就开始了，至少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。双方都有历史文献和实物传说为证，也有不同的学者撰文为其背书，你有古隆中，我有卧龙岗，聚讼纷纭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“南阳说”最权威的证据，来自诸葛亮本人，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……”后人也说，南阳诸葛庐，从来没有说躬耕于襄阳的。而且，今日的南阳卧龙岗，也有不少诸葛亮的遗迹和传说。

但是，“襄阳说”的证据，看起来也十分过硬。因为虽然“躬耕于南阳”证据确凿，但后汉三国时候的“南阳”，和现在根本不是一个概念。那时的南阳是个郡，管辖包括现在襄阳在内的很大一片地方。

不怕河南老乡不高兴，从地理位置上来判断，个人认为诸葛庐在襄阳的可能性更大。因为我们知道诸葛亮是山东人，祖籍在徐州琅郡诸县（山东诸城），先祖迁居到阳都县（山东沂水），诸葛亮出生在琅郡阳都县，但因为父亲诸葛珪早死，他就和弟弟诸葛均跟随叔叔诸葛玄到豫章郡（江西南昌）。他的叔父诸葛玄被荆州军阀刘表任命为豫章太守，当了很短的时间，就被曹操派人给打跑了，跑到荆州治下的襄阳赋闲，不久就病死了。诸葛亮兄弟失去了依靠，也没有被推荐为官的机会，就在当地住下，耕读为业，等待时机。

诸葛亮兄弟隐居的地方，叫隆中，考察历史，汉朝的隆中是当时邓县的别称，邓县故城在今天湖北襄阳西二十里左右。当时属于荆州的南阳郡，所以说躬耕南阳也是没错的。不过从地理位置和常理推断，诸葛亮隐居的地方，应该距离荆州不远。而且他的朋友石楠、徐庶、孟公威、崔州平、司马徽等，这时候都流落在荆州一代，他们同窗读书、互相交游，应该相距不会太远。

由此可见，其实襄阳、南阳之争，更多是历史上地名沿革、区域划分造成的，虽然还叫南阳和襄阳，但跟历史上已经不是一个概念，至于湖北、河南，那时候更是连名字也没有呢。把诸葛亮隐居地之争，上升到两省之争和两市之争，其实根本没必要。

而且，即便争到了诸葛亮隐居地的身份，就代表自己掌握了“诸葛亮文化”的解释权吗？显然不是。要争诸葛亮资源，作为籍贯和出生地的山东，就没有活话呢，还有诸葛亮长期工作生活的四川成都呢。

另外，对于特别有名的人，很多人还喜欢刨根问底，远远先祖。据考证，山东琅琊诸葛氏原本姓葛，先祖是河南东部葛国的国君，曾经与商朝的成汤作邻居，被成汤讨伐过。这么看来，诸葛亮归根结底还是中原人后代，河南人在南阳“失去”的，又在这里扳回一局。

诸葛亮这样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，还有这么多地方争个不停，那些传说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比如伏羲、炎帝，甚至孙悟空、西门庆……

很多地方争名人，是为了争夺旅游文化资源，看重的是经济效益，这种想法已经不新鲜。但问题是，单从经济角度看，这么做也没有那么划算了，效果未必好。比如，襄阳从1993年开始办诸葛亮主题的文化节，至少办了五六次，直到2002年停办。停办的原因，一是因为国家政策收紧，不允许地方政府主办各种五花八门的文化节；更重要的原因，还有经济上的考量，举全市之力搞这样一个节，花费不菲、劳民伤财，最后带来的旅游收入可能并没有多少，转化率太低，投入产出不成正比。

这就，诸葛亮还是一个人都喜爱的著名历史人物，如果是宣传西门庆之流，那效果更不好说了，即便能带来一定曝光率，估计也是骂名居多。所以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。即便要挖掘传统发展旅游业，也要在真正的文化建设上下功夫，而不是搞华而不实的节庆庆典，建一堆假文物。除了诸葛亮，襄阳和南阳的历史文化资源还丰富得很。如果自己连襄阳这样的有历史底蕴的地名都不要了，改来改去让人摸不着头脑，还去争什么诸葛亮隐居地，就有点舍本逐末了。

当然，两个地方争一个名人，也不完全是处于经济上的考量，肯定也有历史文化和感情的因素。但只有抛开地方利益的算计，才能让历史争议回归学术研究，一切用证据和事实说话。而在历史研究之外，对围绕名人的文化旅游资源，有关地方不妨也来个“搁置争议，共同开发”。其实，像诸葛亮这样的人人都喜欢的人物，就让他多兼几个省籍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一个荷马，还有七个国家争呢。